**第三章 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了解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王充思想作为天人感应论思想对立面的意义，两汉经学的发展和论争；两汉思想的方法论特点。**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两汉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秦始皇经历了15个春秋，就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在陈胜起义不久，刘邦也在今江苏沛县起义。因他一路收集散于各地的起义军，不断扩大自己势力，又善于用人(如萧何、仲良、韩信等)，采取“斗智不斗力”的战略方针，取得胜利，建立了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3年)，定都长安。后王莽篡权，汉室豪强刘秀打着“讨莽复汉”的旗号，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推翻了王莽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公元25～189年)。这时期，中国哲学经历了从崇尚“法术”，转向崇尚“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的演变过程。不过，这时期对法、道、儒的崇尚，已修正了先秦时期的法、道、儒，被称为新法、新道和新儒。其原因是法、道、儒三家合流，阴阳融通，日益谶纬化和神化，成为“内法外道”、“内法外儒”，并把道儒宗教化，成为中国以后历代封建王朝进行统治的思想法宝。

两汉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建立后的巩固时期。与此相对应，在哲学上由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逐步融通，最后定于儒术一尊，出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

一、两汉时期的社会状况

西汉初、中期，由于推行黄老的“无为而治”，收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效果，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相继出现了文景之治、武帝称雄和宣帝中兴等“盛世”。但后期土地兼并、政治黑暗，外戚宦官、王侯官僚争权于朝，地主豪强、奸商市侩争利于市，农民一次一次的起义，各种社会矛盾交相牵动、日趋尖锐，王莽乘机篡权。刘秀推翻王莽后只暂时缓解社会的某些矛盾，而外戚与宦官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加剧，出现了“党锢之祸”。仅公元166年至168年两年间，就杀了数百人，禁锢六七百人，逮捕儒生千余人，宦官集团夺取了朝廷内外的全部官职。由于东汉王朝的残忍与腐败，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已名存实亡，历史向三国鼎立时期过渡。

二、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概述

两汉统治者都吸取秦王朝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教训，采用“内政外道”或“内法外儒”之类的思想变术，使思想领域中呈现出汉初崇向“黄老之术”，其后转为“独尊儒术”的倾向。在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的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换言之；汉代罢黜(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先秦诸子之学转入两汉经学。由于经学的基本特征是宣扬混杂着大量鬼神迷信和神秘的阴阳五行说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所以，儒学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改造，即儒学的神学化。而“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的是董仲舒。后来，经学又演化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书经学三派。白虎观会议后，经学却进一步神学化。到东汉末年，在激化的阶级斗争中形成了广泛的批判思潮，逐渐演变成后来的魏晋玄学。

（一）黄老之学在汉初的繁荣

1、黄老之学的经典：《皇帝书》和《老子》

这里讲的汉初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支派。这个学派融合道、法，主张“清静白定”，为稳定汉初政治局势，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经济服务。王充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论衡．自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黄老之学又演变为老庄之学，并与神仙方术结合，演化为“黄老之教”或“黄老之道”。

“黄老之学”的经典是《黄帝书》和《老子》。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文物有“黄老帛书”。黄老之学主要内容有：道是“太虚”，称为“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物本原和规律；统治者应“参之于天地”(《经法六分》)，顺从自然之道，“无为而治”，“合于民心”(《经法。四度》)；强调高度集中的君权和天下统一。

《黄老帛书》吸收了儒法的积极思想，改造了老子的“道“说。它在老子“贵柔”、“不争”的基础上，强调了争取民心而“有天下’’的儒家进取精神，认为“敌者生争，不堪不定”、“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十六经》)。而且调和了儒法之争，发挥了刑德并用的政治思想，认为“黄帝有刑德，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尉缭子》)进而主张以德为先，以德为主，发展了儒家的仁义思想，提倡“主惠臣忠”(《黄老帛书》)，认为君应以臣为师友，应“顺民心”等。这些都是积极进取的哲学思想。

2、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盖公、曹参、陆贾和贾谊等

盖公和曹参以“清静无为”的思想崇尚“黄老之学“。他们主张对地主和农民的活动，尽量少加干预，任其自然发展。这对汉初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缓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陆贾在其主要论著《新语》中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于“讨乱于外”、“法治于内”、“用刑太极”等，提出了“道莫大于无为”，认为朝廷和官吏不要苛扰人民，以求安定社会，恢复经济，使民休息，要“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一边倒)”。这样的“无为”，实际上却是“有为”。

汉初杰出的哲学家贾谊则继承苟、韩，吸取儒、道，在其主要论著《新书》中肯定了宇宙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万物的无限变化过程。又以这种唯物、辩证的观点观察社会，指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合适)，去就(担任国君)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统治很久)而社稷安矣。”(《过秦论》)就是说，国君能观察古今人事盛衰的规律，审视统治者的权势的运用、措施的变化是否合符规律，就能统治得长久，社会就能安定。

（二）“文景之治”后，儒学的崛起和官方地位的取得

1、儒学崛起历史背景

“文景之治”后，国势渐强，急需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由此经过新的整合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儒家经学成为汉代官方哲学。汉儒吸取先秦各家学术思想的养料，补充、改造和完善儒家学说，形成“经学”。经学，是指训解、阐释儒家经典之学，汉代的国学呈现出经学一统江山的新局面，使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大融合，为后世的国学形态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对整个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代表人物：董仲舒

对汉代经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董仲舒（约前179-前104），被认为是中国经学史上的奥古斯丁。他通过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建立了天人感应论，为封建专制寻找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答汉武帝征问“天人关系”的三篇策论，也称《贤良对策》）中提出崇教化、抑豪门、选郡吏等主张，深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其学说得以广行。董仲舒是今文经大师，专治公羊之学，代表作是《春秋繁露》。他用阴阳之说来比附社会，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思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董仲舒传》记其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指出黄老之学日见严重的弊端，改造和系统阐发儒学在安邦治国上的优势，投合汉武帝加强皇权一统、盛世至治的愿望，儒家学说被汉武帝采纳而成为官方学说，大大促进了以五经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发展。

　　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为巩固王权，不断开展造神活动，仰仗谶纬迷信的神权，用阴阳灾异解释儒家经典，假托孔子，怕人不理解其经书而相应地补写了各种纬书，把儒家经典神秘化、宗教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就是谶纬迷信影响的产物，而且广泛流行，及至白虎观会议使经学更加神学化，谶纬迷信登上了国家法典的地位。而以王充为代表的无神论思想，正是批判这股封建迷信思潮的产物。

三、两汉经学

两汉时期，经学师法不同，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派别，两派各守门户，开展了激烈而持久的学术论争，大大促进了经学的全面发展。

（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歧

先秦的文化典籍多书写于简牍或锦帛之上，辗转传抄，数量很少。秦朝焚书坑儒，将民间的典籍焚烧殆尽，项羽占领咸阳时焚烧宫殿，秦博士保存的《诗》、《书》及诸子典籍几近湮灭。因此，汉初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搜罗、发现、整理先秦时代的典籍，最简捷的方式就是重新回忆、记录这些典籍的经文。秦统一中国后，推行小篆，后来又演化为隶书，因而重新记录的典籍多是用篆体或隶书来书写的。《史记·儒林传》“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些先师在讲经时，用的是篆体或隶书书写的本子，这些经书称为“今文经”。

与今文经的口耳相传且用时行字体书写不同，古文经则来源于流传或重新发现的古本经书。汉惠帝四年解除挟书禁令，文景之时广开献书之门，天下所藏匿的古书开始频频出现。《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景十三王传》谓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为搜罗民间所藏，“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王充《论衡·正说》记，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随着古文经书发现的日益增多，古文经学的私人传授与研究也随之兴盛，逐渐形成势力，但受到列于学官占主流地位的今文经学的抑制。

古文经学家对今文经学的压制与排挤日见不满，西汉哀帝时，刘歆上书请立《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于官学，遭到五经博士强烈的反对。气愤之下，刘歆与五官中郎将房风、光禄勋王龚联名撰写《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指诉他们“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斥责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由此开启了国学史上古今文第一次重要学术论争。这次论争以最终刘歆被迫离开朝廷而告终。其后，又有几次论争。

整个汉代，今文经学虽然占据官学的地位，但古文经学逐渐取得优势并成为东汉经学主流。今古文经学在不断的冲突与争论中也趋向融合，出现了一批古今文兼收并蓄的学者，如：今文学家李育涉猎古学，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古文学家贾逵教授《大夏侯尚书》，郑兴少学《公羊春秋》等。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家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出身古文家而兼通今文，其同学及后学也多如此。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除在字体上不同外，在文字、篇章、名物、制度、解说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文字上，因所用底本不同而有出入，其后各经的注疏及《经典释文》中都有说明。篇目上也有不同，如孔安国《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说解方面，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为后世立法的素王，为此目的而手定五经，故他们多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并掺杂阴阳谶纬之说意述己意；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对其中一部分进行过整理，故他们在解经时侧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的考释，力求还其本来面目。目的不同导致五经排序方面也有不同，今文家按照学习层次的难易排序为《诗》、《书》、《礼》、《易》、《春秋》，古文学家则按照时代排序为《易》、《书》、《诗》、《礼》（古文学家认为周公作《礼》）和《春秋》，《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分别是这两种排序方式的代表。

今古文经派的争论在汉代，但对整个后世的国学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可谓中国学术领域内的第一大公案。经过两汉近四百年经学派别的论争与磨合，儒学最终得以经学的形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性学说。汉以后，历代都提倡儒学，儒学经典的地位不断提高，说解、注释、补充儒经的著作也倍受尊崇，经学不断发展，由“六经、五经”相继增为“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等，至北宋宣和年间，朝廷以《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论语》、《孝经》、《孟子》合称“十三经”，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合刊《十三经注疏》，明代李元阳、清代阮元重刻《十三经注疏》，经学典籍之数得以固定，其重要注疏也得以广泛流传。

（二）阴阳谶纬学说及其批判

 随着经学的发展，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极为盛行，顾颉刚认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2]战国时代的邹衍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创造“五德终始说”和“符瑞说”，被秦汉道家和儒家所借用，开启汉代天人感应说的先河。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将整个世界纳入该模式中，提出“三统”、“三正”的学说，确立三纲五德的理论，为中国社会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学理基础。汉代谶纬学说的兴盛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有很大关系，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汉代儒家学者为巩固自身地位，也利用谶纬学说来宣扬儒学思想，使两者进一步结合起来。于是，“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以政令配月令”等思想成为整个汉代的主流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形成于东汉末的道教更是充满了阴阳五行学说，如在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和于吉的《太平经》中就有突出的表现。

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多言灾异祯祥。西汉时期，谶纬之说未盛行。王莽篡汉、刘秀起兵等都矫符命、造谶语，由于他们的利用和提倡，谶纬之学方始大兴。

谶纬学与古今经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东汉的一些谶纬学家往往兼通五经，古文经学家也有涉及谶纬之学者。东汉时期，古文学、今文学和谶纬学三股学术思潮是彼此交融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白虎观会议就是试图精简章句并对三种学术倾向进行统一，班固编就的《白虎通义》是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古文经学，大量引用谶纬学说，打破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经学和谶纬学之间的界限。

 谶纬学说导致经学的神秘化和庸俗化，曾招致众多学者的不满，前期有扬雄、桓谭、郑兴、尹敏等，后期有王充和张衡等。这些学者对谶纬学说的批评，显示了汉代学术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当然，汉代纬书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保存了不少历史传说和语言文字资料，对学术研究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复习与思考题**

1．谈谈对两汉经学的认识

**拓展阅读书目**

1．《淮南子集释》，何宁撰，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2．《春秋繁露义证》，苏与撰，钟哲点校，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3．《论衡校释》，黄晖撰，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4．《说文解字注》，许慎撰，段玉裁注，上海：上海书店 1992 年版。

5．《汉书》，班固撰，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